



金融研究简报

第十六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3年12月16日

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是优势而非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也开始加剧，并逐步趋于扩大。不平衡现象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地区发展差距等。2013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了以“中国的不平衡增长问题”为主题的讲座，并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剖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黄育川教授在讲座中做了精彩演讲，并与现场嘉宾展开热烈讨论。与会者

认为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一种优势，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不平衡状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中国也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服务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更好地发挥财政预算的作用。

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一种优势，而不是问题

黄育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我想讲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和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否真是这样？我认为不平衡是一种优势，而不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GDP增长率很特别，在过去二十年里以年均10%的增长率增长，而且发展一直非常好。图1所示，纵坐标是2000 - 2010年的增长速度，横坐标是1990 - 2000年的增长速度。在这两个时间段里中国GDP的增长率不同但都很出色。

中国的投资比例也很特别。2011年的投资比例是GDP的50%，高于

中国GDP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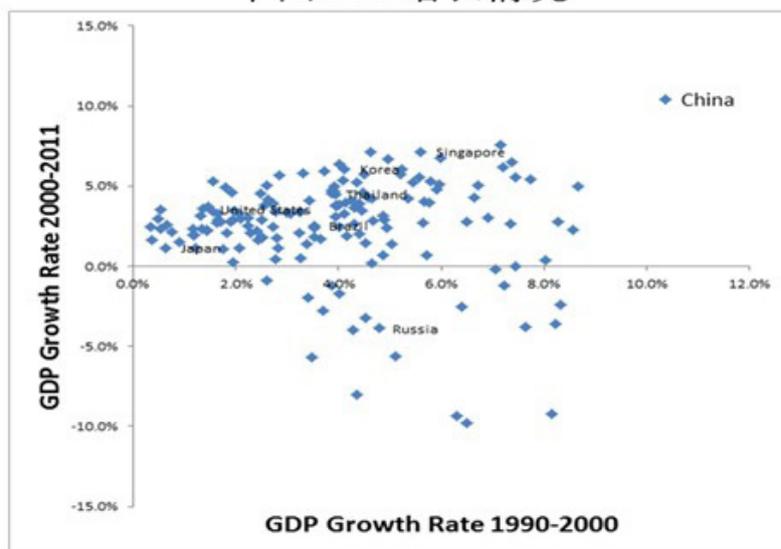


图 1

其他国家。而消费比例是全世界最低水平，占 GDP 的比例很低。增长率、投资率最高，但消费比例最低，这是奇怪的现象，而且它们同时发生。

很多观察家分析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弱点，但他们误读了其意义。其投资率在之前是 35% 左右，后增长到 50%，而消费率则从开始的 45% 不断下降。目前消费所占比例最低，投资所占比例最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坏事。

一些主流观点认为低利率导致了投资发热增长，却阻碍了消费的增长，从而导致不平衡的现象。不平衡的因素主要来自城镇化过程，城镇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益的，它使大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如 15 年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也导致了不平衡的现象。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影响消费占 GDP 的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家庭收入减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也会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下降，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整体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分为四个部分，即：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曲线会有所不同还是完全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图 2。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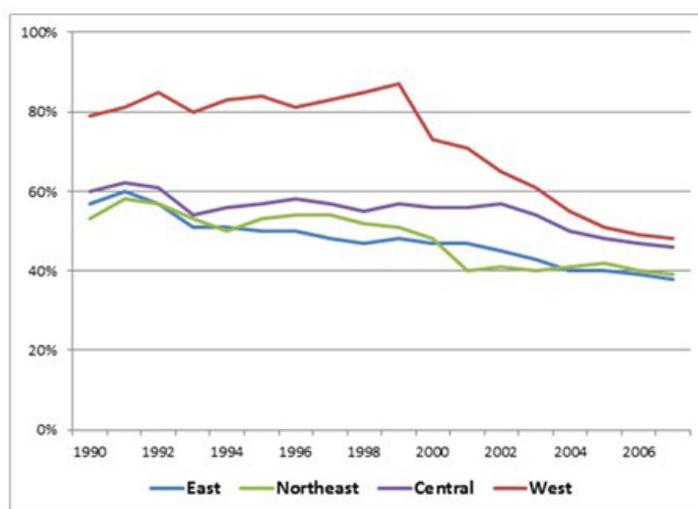


图 2

有人认为每个区域的曲线走势应该都一样，如果有剧烈的上升或下降，应该发生在东部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但他们是错误的，因为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中国西部。西部原来的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 90%，现在下降到 50%，这是非常剧烈的下降。

而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变化比较平稳。图 2 显示中国的不平衡现象与东部的贸易商业等问题关联不大，而与西部的变化有关，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西部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重要性来说，都不那么重要，它只占中国 GDP 的 18%。

正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了这种不平衡问题。假设湖南有个农民种大米，每年收入 1 万元。去掉种子、化肥等 1 千元的成本，他净收入 9 千元。在这 9 千元中，他消费了 7 千元，存下 2 千元。

他又去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付给他 3 万元工资，是以前的 3 倍，他变成了农民工。一个农民工储蓄 1.5 万元，花费 1.5 万元。公司从日本、台湾等地购进零部件和资本，共占 6 万元。

种大米时，他获得 1 万元，收入 9 千元，消费 7 千元，储蓄 2 千元；进工厂后，有 6 万元增值额，他获得 3 万元工资，一半消费，一半储蓄。他当农民时，劳动力占生产总额的比例是 90%；进工厂后，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 50%，而消费占 GDP 的比例则从 70% 下降到 25%。

这表明，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导致消费比例下降，这是不平衡的发展表现。产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收入增加了，消费翻倍了，同时储蓄额也增加了，原来储蓄 2 千元，现在储蓄 1.5 万元，储蓄增长的水平高于消费增长的水平。而他所在的工厂生产大量产品出口，又再投资，每年又产生 6 万元增值额。

由此可见，不平衡增长并不完全是坏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认为不平衡增长是坏事，可能是因为消费没有快速增长，或者说消费的增长

被抑制了。

其实每个中国人的消费增长率按实际数额来说每年增长 8 - 9%，是增长最快的。其增速快过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集团。

有人说中国需要靠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因此消费占 GDP 的比例应有所提高。而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所有经济的增长都基于投资和生产。所以“中国需要消费驱动型增长”，这一说法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态势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很相似。图 3 显示的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在快速发展时期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额度占 GDP 总额比例的下降趋势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但除中国外的这四个经济体都从低收入地区变成高收入地区。

中国的不平衡增长类似于其他亚洲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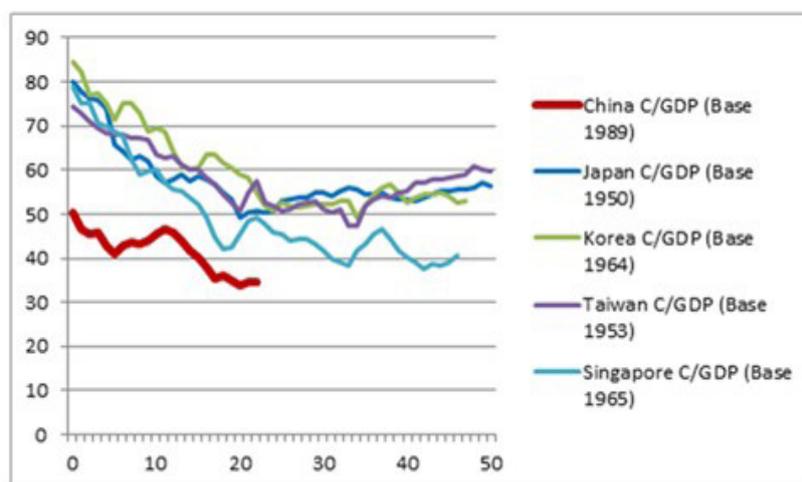


图 3

在过去 30 - 40 年重，100 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 6 个国家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等收入国家。而所有实现由中低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国家都经历了不平衡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些转型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如果

他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平衡的，那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实现这种跨越。

150年前，美国是拥有最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那时美国的消费比重占GDP总量的50%，而在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50%以后，美国则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由此可知，经济上的不平衡的增长其实是成功的迹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城镇化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如果成功实现城镇化，将极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最终得以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模式。

我认为，中国在土地使用的层面上已经过度城镇化，但在人口结构的层面上还不够城镇化。

我做过一个关于城镇化的研究项目。人们从农村到城镇会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如果城镇化进行顺利，经济模式会变得不平衡，而不是平衡，所以这不是值得担心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城镇化太慢，服务业太落后。图4展示的是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城镇化程度及服务业占GDP总量的比重。可以看到在1960-2011年的51年间，日本城镇化水平从60%上升到90%，韩国从40%上升到80%，台湾从25%上升到85%，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也随之上升。

中国的城镇化与服务业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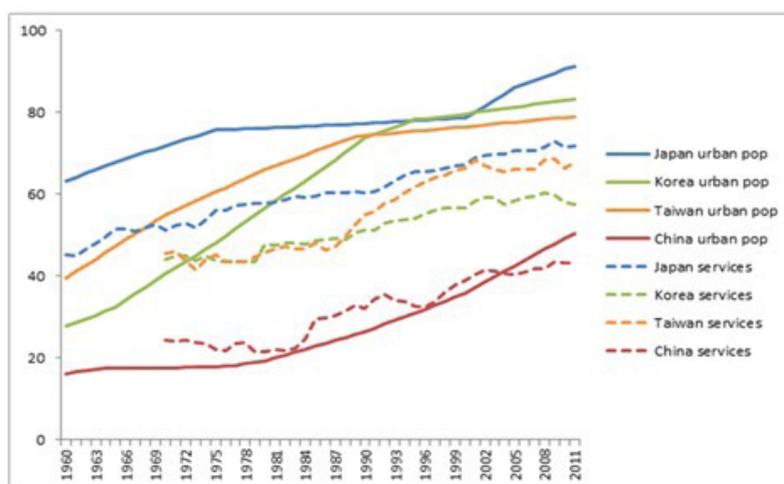


图 4

截止到 2011 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大概是 52%，服务业所占比重也随之增长，但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水平。其服务业的发展轨迹和城镇化的轨迹靠得太近，而不是完全分开状态。

日本、韩国、台湾正是在城镇化和服务业都达到高水平时才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转型。而这些地区也是直到收入达到高水平以及城镇化速度下降时才实现了经济的平衡发展。

因此我预测，中国至少要到 2020 年才能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

刘志勤（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前瑞士苏黎士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表现在以下几点：产业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农业和工业之间发展不平衡；贸易和制造业之间发展不平衡。

黄先生认为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时间大概要持续到 2020 年，这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长期不平衡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承受不了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压力。因此虽然不平衡属于驱动力，但要掌握度和时间。

Martin Lees（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人大重阳国际高级研究员）：我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化对文化、环境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乡镇企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当时的目标是实现更为分散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现在进行城市化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了，黄先生已经阐述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和提高收入之间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分析城市化对环境、文化等因素的不确定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使许多分析师开始怀疑经济领域的一些因素。

而所谓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显得很虚无，因为它建立在经济贷款泡沫的基础之上。例如美国就曾经在城市化的某个阶段忽略了基础设施、教育

等一系列国家福利项目的发展。

文佳筠（美国 NGO 组织全球化国际论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我一直怀疑主流观念所说的中国消费不足的说法，很高兴能听到黄教授在这方面详细而全面的反驳。特别是在农业和食品行业，中国的食品消费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成年男性每天只需要 2 千大卡的热量，而中国人均摄入量已超过 3 千大卡，中国人的肥胖率已经赶英超美。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在经济意义上，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不是件坏事，但在社会意义上，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比较坏的事。过去 35 年里，东西部不平衡、城乡不平衡、贫富不平衡。而 35 年后，这三个不平衡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如何解决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

中国应增大预算作用，缩小银行作用

黄育川：人们说中国投资比例增长太快，从而导致生产回报率太低。

我认为，中国资本回报率下降有两个原因，即西部大开发政策和 2008 年经济刺激计划的实行。

图 5 是西部地区投资占其地区 GDP 比重以及沿海省份投资占区域 GDP 的比重。在 1985-2007 年的 22 年间，沿海省份投资占地区 GDP 的比重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而西部地区投资所占的比重却迅速上升。

西部地区投资占其地区GDP的比重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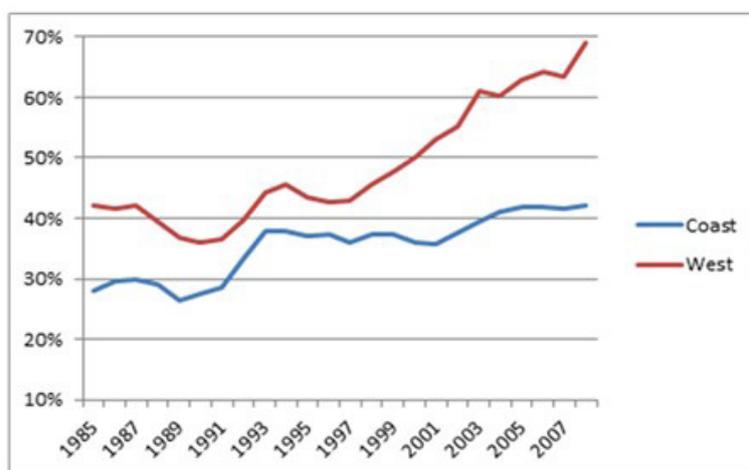


图 5

西部地区投资所占的比例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也同样高。投资效率是指增量资本产出比例（ICOR），而这个比例是越低越好。从图 6 中不难发现东部省份的 ICOR 数额比西部低，说明东部沿海省份的投资回报率比西部高。在沿海省份，ICOR 的数额变化不大，这表明当地的投资效率不错且相对稳定。

投资效率指增量资本产出比例（ICOR） 比例越低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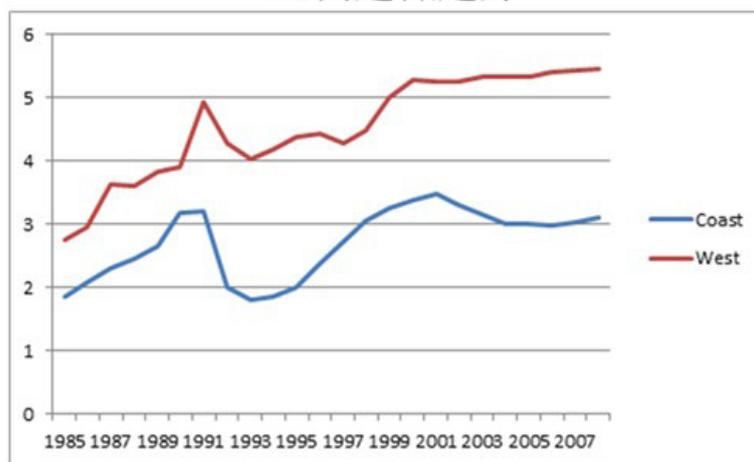


图 6

如果仔细观察图 6 中两条曲线的区别，就会发现西部的 ICOR 数额比沿海地区的更高，这说明如果大规模在西部进行投资，资本效率较之在沿海地区投资会更低。

中国政府采取西部大开发这个措施是因为西部地区人民较贫困，想要提高西部人口的生活水平。结果在近三四年间，内陆省份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沿海省份。西部大开发政策固然对内陆的发展有利，但它也导致了全国投资效率水平较低。

因此有分析家提出应该让中国银行体系变得更简洁，应加强非银行投资平台的建设，如股票、证券、基金等平台在金融体系中的比例。

三中全会很重视财务问题和债务问题。中国的预算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而不是银行问题。而中国的财政问题涉及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配，妥善处理则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如果不解决预算问题就不能促进发展，也就不能解决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银行发挥的作用太大，而财政预算发挥的作用则太小。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会认为中国的国家财产更多，与西方相比所能提供福利也就更多。但实际上中国跟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或低等收入国家相比，它的国家财产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成立地方投资公司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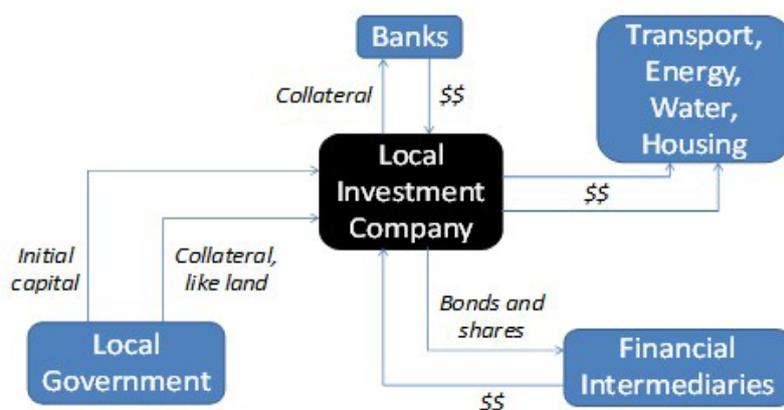


图 7

地方政府没有太多征税的权力，于是成立地方投资公司增加收入。地方政府提供给地方投资公司初始资本、抵押品（土地等），使其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地方投资公司用这些抵押品向银行贷款，同时又向金融中介借钱，再用公司的债券和股票作为回报。他们用这些资金进行交通、能源、水利、住宅等方面的建设。而这些项目工期长，所以没有办法及时归还银行和中介的借款。

因此要解决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其核心是要解决图 7 显示的问题，限制这种不正常的投资关系。只有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才能限制地方投资公司的活动。

Marc Uzan（法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创办人）：从世界经济角度经常会讨论美国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体的影响。这次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在金融、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些领域，也许会采取一些行动，而中国要采取的改革政策，也将影响到国外经济体。

黄育川：西方关心的关键问题是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大概是 GDP 的 2%。很多西方政客要求中国降低投资率，控制贸易顺差，其中一个方式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但这会导致中国的收入和生产力下降，这对中国是不利的。实际上，中国从国外进口材料、资源和零部件，是为了出口更多商品。因此如果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同时也就降低了西方的出口量。

而关于利率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小型银行的存款基础薄弱，他们为了吸引更多存款就会提高存款利率。但很快这些小型银行就会破产，因为他们付出的利率太高了。

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问题，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谨慎地控制资本流出，对资本流入则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也有人提出先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出，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资本流入，资本流出太少，所以外汇储备太高，中国家庭的银行存款量很高。如果让这些资本流到国外，房地产泡沫的风险会逐渐消失，银行间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而一旦资本自由流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小。所以应该让这些钱流向国外，这与平时的建议相反，因为中国确实跟其他国家不同。

中国的发展很独特 西方政策不适用于中国

黄育川：中国投资率很高，中国的储蓄率是 GDP 的 52%，我们从没见过投资率那么高的国家，而其储蓄率还比投资率更高。可以预见，短期内西方资本会不断流入中国。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是很独特的。虽然西方的分析工具很强，但如果想在中国利用这些工具，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独特的发展状况。所以中国的大学生学习西方的知识和观点，必须很谨慎，因为并不是西方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

Martin Lees：我同意黄教授所说的，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政策都适用于中国。现在有个危险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殖民化，他们将西方的观点不恰当地运用到其他国家。

除黄教授和王院长提到的不平衡现象外，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资源方面是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如中国现在的地下水位与 80 年代相比已经下降了 100 米。

刘志勤：消费作为驱动力的问题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还是应该承认消

费是驱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在外国还不了解中国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国内的内部消费驱动的，是先有内部消费才有外部投资，因此消费驱动功不可没。

黄育川：从生产能力来讲，GDP 跟需求有关。GDP 可分成政府、企业、家庭等不同层次。如果要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先要考虑谁能够消费这些商品。这会导致经济周期问题，有时必须调整需求结构。在提高生产力时，必须考虑产品要卖给哪个层次，是卖给政府，还是个人。消费是短期的，而发展和增长则是长期问题。

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给编辑部（电话 010-62516305） 责任编辑：胡海滨 审核：王文

分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人大办公室，全国政协办公厅
有关部委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
各金融机构负责同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官方网站：rdcy-sf.ruc.edu.cn

邮箱：rdcy-info@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公众微信号：rdcy2013